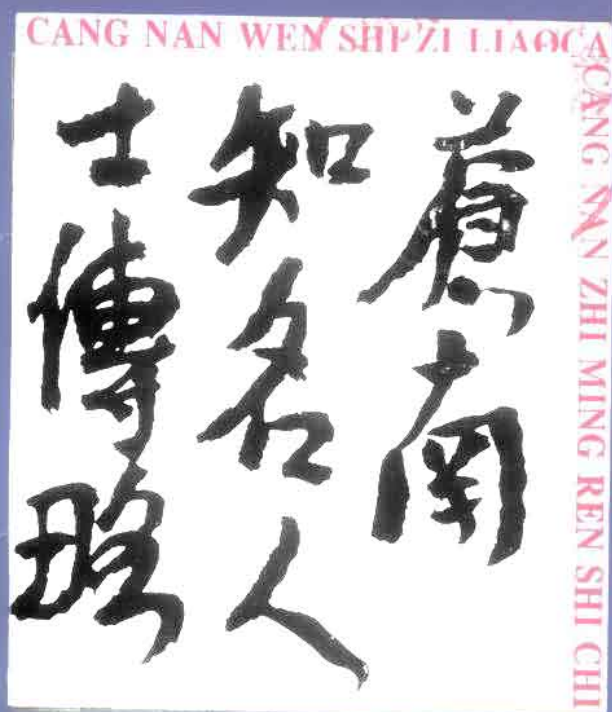


蒼南文史資料 |

第十三輯

蒼南知名人士傳略之四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浙江省蒼南縣委員會
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蒼南文史資料

——蒼南知名人士傳略之四

政協蒼南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一九九八年三月

目 录

陈青莲自传 / 陈青莲	1
陈紬艺自传 / 陈紬艺	9
笔底斑斓 丹青辉耀 ——记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系主任苏春生教授 / 谭根雄	32
林剑丹先生传略 / 陈忠康	45
我的小传 / 林文翰	60



陈青莲自传

我于1921年4月19日出生于平阳县江南区宜山镇上市街一个工商兼地主的家庭。就我父亲的文化程度而言,只能说是粗识几个文字的商人,母亲是个文盲。由此可见我自幼就无缘得享书香门弟的家学熏陶。后来之所以能侥幸继续升学乃至出国深造,一半靠努力,一半是机遇。

一 中、小学时期

记得我在宜山江南中心小学的读书成绩，充其量只能算中上。在小学毕业前后，家庭中由于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再加上商业上的经营无方，家道衰落，几乎濒临破产的边缘。所以就那时我家财力来说，是绝对无力培养我去温州读中学的（当时平阳尚无中学，瑞安也只有县中）。可我仍然随同同班毕业同学上了温州，报考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即现在的温州一中。当时全省只有十一所省立中学，按照杭嘉湖、宁绍台、金衢平、温处十一个专区的次序来命名的。由于省立中学师资力量较好，收费较低，所以报考者众，录取标准也很高。以那时的省立十中为例，秋季招收初中新生一百名，而报考人数近千。考生如果考不取这所省立中学，尽管还可报考较易录取的旧温属六县（永嘉、瑞安、玉环、乐清、平阳、泰顺）联立中学或私立瓯海中学，可这两所学校学费昂贵，贫家子弟哪敢问津。

那时入学考试录取与否，不是像现在那样邮寄通知，而是在学校大门口张榜公布。真是喜不自胜，到了揭榜那天，我的名字竟然出乎意料地高居第二名。而学业成绩比我好的同班同学林谷（他于1937年参加革命，建国后历任福州军区特务团政委、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和军事博物馆副馆长等职），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抬起头、瞪着眼在榜上细细地看过来望过去，却始终找不到自己名字的踪影。毕竟还是稚气未脱，经不起挫折的孩子，他在大庭广众之前突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他终于在翌年考取省立十中春季班）。

总算侥幸以高居榜首的优异成绩考取了温州全区唯一的一所省立中学，可要筹措一学期相当于五十元银元的学膳费仍然是无能为力的，幸亏邻居一位富商温知新先生慨然借给全部学

费，我才得以踏进这所省立中学的大门。在此必须一提的是，翌年国民党省政府教育厅规定：凡各省立中学学生，每学期学业成绩在全班前五名且家境清贫的，经查证核实，可得到每学期五十元的奖学金（相当于中学一学期的全部费用）。这样，我就依靠这项奖学金顺顺当当地完成中学六年的全部学业。

写完上面这段求学经历，我想即兴来个现身说法，聊作后学者的参考。我今天深切地体会到，中学阶段特别是高中阶段是奠定一个人一生得失成败的关键时期。无论你将来读的是哪类专业，都要在中学阶段预先广事涉猎，以便打好基础。最好能兼通文理，不要“偏科”。这是我在将走完人生道路之前的切身体验，也是我的肺腑之言。以我自身为例，从表面上来看，我在中学阶段的学业成绩，差不多门门功课都在八十分以上，尤以英语较为突出。即便如今到了衰迈之年，仍然清晰地记住中学英语老师教授的语法和词类变化的一些准则，使我一生受用不尽。但令我深感遗憾的是，没有打好扎实的语文和数学功底。我认为要打好语文基础，必须要多看课外读物，要浏览一些主要的文史典籍，如现代作家的名著以及古典文史名著如《红楼梦》、《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等。要搞好数学，重要的是知其所以然，也就是对一些数学概念要明确熟稔，才能得心应手，运算自如。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日新月异的今天，很难截然分清哪些领域是纯粹的理科或文科。例如经济学，从前都认为属于文科，可二次世界大战期中出现的运筹学（即管理科学）和计量经济学，就要用到一些高深的数学原理和运算法则。所以到了今天，我才恍然大悟到：数学是所有学科的基石，它严密的逻辑推理是现代科技赖以发展的依托。

二 大学时期

从高中二年级起，抗日战争烽火就燃遍祖国大地。翌年，温州中学就搬迁到青田水南。同时，沿海各地大专学校也纷纷内迁。清华、北大、南开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浙江大学搬到遵义，武汉大学迁到乐山，中央大学则在陪都重庆。

高中毕业后何去何从，真是费尽思量。去内地升学吧，首先得筹措一笔可观的旅费和学费，这是我不敢奢望的。所幸我考取了国民党政府一所设在成都的空军飞行学校，并由航空委员会（实即空军司令部）派人到丽水接送在浙江录取的一批考生到重庆附近的铜梁，接受飞行前为期三个月的入伍训练。由于敌人的交通封锁，教练飞机无法及时运到。我在入伍训练期中等了大半年，仍然没有开赴成都学习飞行的消息。经过慎密思考，我就决然冒险开小差逃了出来。先到重庆，后赴贵阳，终于在贵阳医学院找到一份工作，暂且栖身。我就一面工作，一面温课，准备报考国立大学。考虑到昆明的西南联大虽然名师荟萃，学术拔尖，可那里的物价太贵，权衡下来，就以第一志愿报考中央大学经济系，并被如愿录取，时在1940年10月。

那时由于沿海及中南各省先后沦陷，内地大学学生经济来源都被切断，国民党教育部只得作出权宜规定：凡国立大学学生免交学费，膳费由政府发给全额贷金（实际上是免费供应膳宿）。所以只要自己设法搞到一些零用钱，日常生活就能勉强对付过去。不过物质上非常艰苦，一个月难得吃上一两次荤腥。

1944年4月，离毕业只有两三个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突然下令：凡本届内地各大学毕业生，不管哪一院系，都要全部征调去当盟军翻译。临分配前还进行一次测试。然后由美国军方派员来校教授军用英语。经过短期口语训练，派赴国内外各

战区工作(国外战区主要是中国远征军所在的印度和缅甸战区)。我以英语测试全校第二名的成绩免受训练,即时起赴印度缅战区报到。那时印缅战区当局计划从印缅边区的雷多打通一条国际公路并铺设一条输油管直抵中国昆明(当时缅甸北部尚盘踞着日军,要打通这条国际公路,当务之急就是肃清该地残敌。国民党的孙立人、廖耀湘部队就是担任肃清敌军的主力,而美国军方则只负责总指挥和全部后勤工作)。我被分配到印缅边区一所负责收治中美双方伤病员的美军医院工作。记得当时我还写了一篇《我们在印度》的战地通讯,寄登重庆的《大公报》。1945年8月,日军投降,抗战胜利结束。我就复员回国,先后在广东信宜中学和上海暨南大学担任教学工作,并通过国民党教育部主办的自费留学考试。

三 1948年以后

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日战争胜利甫告结束之际,就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内战。搞得民穷财尽,物价飞涨。由于通货膨胀,美元黑市价格为“官价”的30多倍。经过自学考取留学学生的数次请愿、申诉,国民党政府只好答应以“官价”向自费留学学生出售外汇。记得当时我只以一個多月的薪水买到一千多元的美元外汇(国民党财政部只答应先卖给半年所需外汇,计学费等900美元,另加180美元赴美旅费)。那时出国的交通工具,主要是坐海轮。由上海至美国西海岸旧金山,需耗时20多天。航线北线途径横滨、关岛、檀香山;南线途径香港、马尼拉、关岛、檀香山。二十多天的海上航行,可谓单调乏味之极。日复一日,看到的无非是碧波白云,海天一色而已。

我在美国就读的是在中西部靠东的州立密执安大学,校址所在地毗邻加拿大。一般而论,州立大学的学费较低,只及著名

私立大学如哈佛、耶鲁的十分之一，入学条件也没有像私立名校那样严格。比如耶鲁，以外语条件而言，要求入学研究生除英语外还必须懂得法语。在旧社会，有人说出洋留学好比是“镀金”，不过据我自身的体会，这个“金”并不好“镀”。首先，你得过言语言关，看书的速度要快。因为给研究生指定看的参考书既多且杂，不容得你慢咽细嚼。当时有位中国同学形容研究生严格艰苦的学习生活如同监狱，我认为讲得并不为过。其次，不同于大学本科生，研究生的平均学习成绩必须是B(80分)以上，才能拿到学位。

在美国学习将近一年，眼见反动派政府垮台，祖国获得解放，同时也由于外汇供应中断，我于1949年夏毅然回到上海，任教于上海商学院(后改为上海财经学院，即为现在的上海财经大学)。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公职，在江西彭泽芙蓉农场呆了二十多年。1978年春，我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同志，申述自己的身世和愿望。此后不久，江西省委派人到农场找我面谈并面试英语。据事后了解，邓小平同志在我的来信上亲笔批注：“如此人无大错，请江西省委为他安排工作”。同年10月，我有幸先于其他“摘帽”右派调离农场，到九江师范专科学校英语系任教。1980年夏，又调到复旦大学经济管理系。

四 最近十年的情况

十多年前，原上海市市长汪道涵赴美洽谈经贸工作，带回一本 EnCYCloPediae of magement (管理百科全书)，交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嘱咐请人翻译出版。该书是一本经营管理方面的煌煌巨著，洋洋 250 万多字，分别由复旦、同济、财大等校包干翻译。我负责复旦这片的译校工作。前后历时四五年，才得以付梓出版。1990年，我受国家教委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之托，主编自

学考试教材《工业企业生产管理》、考试大纲及自学指导书,交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上列各书前后发行约 8 万册,并经修订补充后,于 1996 年再版发行。鉴于当今国外生产管理新颖题材迭出,目前我正在潜心研读一本 1995 年版美国南加州大学 Richard B Chase 教授撰著的 Prouctiou and operatios hlanae-ment (生产运作管理),打算部分以该书为参考花它 3—4 年时间,为再度全面修订拙著自学教材准备素材。

著作、论文和译著

《我们在印度》1944 年发表在重庆《大公报》,系战地通讯报导

《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1953 年由上海立信会计用品社出版,20 万字。

《管理百科全书》此为译作,全书 240 万字,我担任主译,1986 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北美大陆的初期移民》发表于上海解放日报《新论》副刊。

《工业企业生产管理自学考试大纲》此系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用书,国家教委自学考试委员会约请撰写,约 3 万字,由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 1985 年出版。

《工业企业生产管理》《工业企业生产管理自学指导书》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国家教委自学考试委员会约请撰写,前者为 40 万字,后者为 15 万字,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于 1991 年出版,先后共印刷 6 次,共发行约 14 万册。

《工业企业生产管理》修订版,40 万字于 1996 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刷为 5000 册。

《工业企业生产管理自学考试大纲》修订版,1996 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工业企业生产管理自学指导书》修订版,15 万字,于 1997 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刷为 1 万册。

又：为使生产管理教材与国际接轨，打算根据美国南加州大学 Chase 教授与亚利桑那大学 Aguilaho 教授合著《生产与运作管理》一书原文第 7 版（95 年版）为蓝本，将拙著结构全面进行调整、修订，计划于 2000 年杀青付梓。

陈青莲简历

1944 年毕业于前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

1944—45 年由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令征调至印缅战区充任少校译员

1946 年任广东信宜中学高中英语教师

1947—1948 年任上海暨南大学助教

1948—1949 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深造

1949—1958 年先后任上海商学院（后改称上海财经学院，即现在的上海财经大学）讲师，1951 年升为副教授

1959—1978 年被错划为右派，在江西彭泽农场劳动

1978 年 10 月，调至江西九江师范专科学校外语系任教

1980 年调至上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经济管理系任教

1985 年晋升为教授



陈 绚 艺 自 传

——我的简历和中华自然疗法医学的创立

我的家世、环境和研习中医以及自然疗法之原因

我姓陈,名绚艺,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二日出生于浙江苍南柘园地方。原名周义,在温州习中医的时候,业师池苏翁先生,要我改名绚艺,绚音绸,抽丝之意,古书(书名待考):绚绎六艺之父。绚艺与周义谐音,但较为文雅。我就照他老人家的意思改

了。不过，这个铀字过于冷僻，很多人叫不出来，也常常写错，变成“岫艺”、“铀艺”、“抽艺”、“绸艺”或“由艺”。我说，就叫“陈医师”好了！

我老家的房子很大，有围墙，光是水池就有三座，有可供饮用的水池和荷花池等。据知是我的曾祖父由于经商得法，薄有资财，那时是在清朝，他还捐资买来一个可以头戴红缨帽的官职（是什么官？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不懂，从没有问过大人）。他先后娶过七位曾祖母，因为每一位娶来不久就死，不断的续弦，所以我家的亲戚就特别多，且有若干是国内颇有名的人。但祖父却在成亲之后不久就过世，祖母守寡到三十岁左右也就死了。祖母家是当地的大财主，陪嫁的嫁妆听说是十八只河泥船；祖母守寡的自律之严，却是里闾称叹的。父亲是遗腹子。很聪明能干，但不守家业，后来等于坐吃山空，一穷二白。解放后已进入暮年，但由于我和大哥在台湾的关系，他还要受牢狱之灾和下放之苦。母亲出身名门，外祖父中过举人，清廷保送他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回国后，曾在北京当一名七品京官。鼎革后，回乡闭门谢客，不问世事。我爱好国学，多少和他有一点关系，我来台湾的时候（一九四六年），外祖父母俩都还健在。

我兄弟五人，我是老二，大哥和三、四弟已先后亡故。现只剩下我和五弟。

我在幼年时期患了中耳炎，不幸左耳的耳膜破了，听觉很差。曾先后在宜山、钱库读小学，上课时老师所教的听不到一半，有读等于无读。年少胆怯，又不敢说。虽然侥幸毕业，但是实在无法上进。于是父亲就替我找到一个名叫“宣文书院”的，也是教一般中学的课程，主持人上是蔡孟平老师。后来，又跟从三石桥的宿儒何志舒老师，专修国文，稍稍打下一点国学基础。

我从小就对中医有兴趣，家中藏有不少的中医书，都是木版本的，我推想可能曾祖父还是一位医生。后来父亲就送我到温州池源翰老师（字苏翁）所办的“温州国医国学社”求学。经过若干

年之后，抗日胜利，于一九四六年来台，经人介绍，进入一个国营事业机构工作，一边仍研究中医，与国外名宿，如滞留在香港的陈存仁、谭述渠、张公让、庄兆祥医师等，时有书信来往，订忘年和文字交。一九五〇年，考试院举办自大陆迁台后的第一次中医特考，我报名参加，以优等第二名成绩及格。并取得中医师资格。我那时才二十七岁，拜同乡五绝（诗、书、画、医、拳）老人郑曼青先生为师，他说我还年轻，宜继续读书。我服从他的教诲，仍旧去当一名职员拿薪水过活，可以说一生与“钱”无缘。后来，于一九六〇年左右才离职独立开设诊所。

那段时间，中医界争取设立中医院校成功。但外界尤其是西医对中医很不了解，总认为中医不科学，中医不知细菌。报章杂志，不断出现批斗的文章。中医界虽然力求自保，但只有招架之功，毫无反击之力，情势岌岌可危。那时（一九五四年），恰有一位德国某医科大学的教授，名叫许米特，他又是外科主任，认为手术治疗，既麻烦又危险，常常在想，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取代呢？后来终于学到流行于欧洲的“同类疗法”——一种只用内服药而不需要开刀的疗法，就把手术刀抛弃而改做“同类疗法”医生，他又知道东方的医药和针灸的优点，特专程到日本学习，归程经过香港，畅论中医尤其是“伤寒论”的伟大！翌年，又在香港中西医师张公让办的《中国新医药》上，读到英国朋占明的“自然医学”的著作，长期连载，把西医骂得极为难堪；而且它和同类疗法一样，都反对细菌病源之说。我得之，如获至宝，认为“中医的救星来了！那时中医处在围剿之中，大家要求郑老师出面，找新闻界帮忙，主持公道，终于获得《自立晚报》负责人李玉阶先生之首肯，读了我写的《中医的不科学和太科学》一文，就把该报的第一版“社论”园地让给我用“专论”刊出，一连几天，分章节刊出，作为回应。刊出之后，大家就注意对方动静，直至知道对方并没有什么大的动作，才放下心来。（参见下文第二节第四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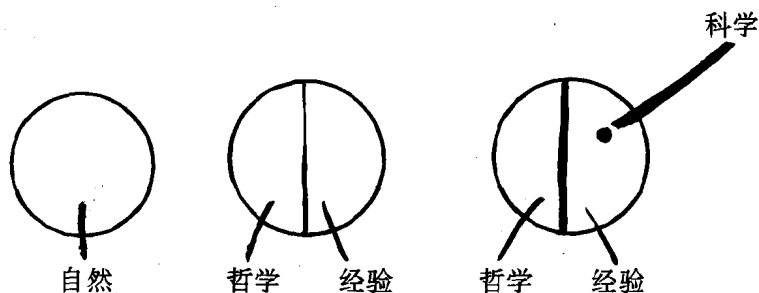
可是很多同道在谈这个什么“同类疗法”、“自然疗法”时，对

之兴趣缺缺；有的还看不懂两者与中医究竟有些什么关系？而我却认为这两者所说的，百分之一百，合于中医的原理，不过彼此详略不同，互相对勘，启发很大，趣味无穷。所以我始终要求中医应与西方的“同类疗法”、“自然疗法”结合起来，这就形成我日后所创立的“中华自然疗法”。但是现在回想起来，真正要看懂这两种医学和中医学说的关系，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到了现在，很多同道还是不明白。

什么叫“科学”？什么叫“不科学”？为什么“科学”治不好的病，被“不科学”的治好了？这也是“自然疗法”学者常常提出讨论的问题。有些学者认为中医不是“不科学”，而是“未科学”而已；有些学者认为“中医”是“超科学”，这也是我当初称之为“太科学”的意思，有些学者则认为目前的西医还不能称为“科学”。这些都在我所创办的《自然疗法》杂志上专题的讨论。如果很轻率的一句“不科学”，就想把中医打倒，天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可是大家都在不知就裹的被“科学”牵着鼻子走，以为科学就是真理。而我的看法则是：科学演变到现在，最为世人所畏惧与诟病者大致有三：一为对大自然环境之破坏（尤其是“温室效应”及“臭氧层破洞”问题）；二为核能灾害；三为对人文主义精神的贬抑。总而言之，得不偿失。

此所以，现代人对“科学”，就产生了两个不同的意见：一个是认为科学还在起步，无论再怎么进步，但生命无法制造——所以科学想造一根草也不可能，科学只能在物质方面发展；一个是认为科学已登峰造极，应该悬崖勒马，再发展下去地球必先行毁灭。此所以“回归自然”的呼声，不绝于耳；更何况中医是生命科学，能够完全靠物质科学来解决吗？

推想人类在未有科学之前，大多靠“经验”来解决问题；经验有不足，则以“哲学”补充之。这就是人类能够存活于世而且绵延不绝的道理所在。试为图解如下：



科学就是这么一点点，而且科学必须在“经验”与“哲学”基础之下发展，始无弊病；而一般人的主张，只要“科学”，不要“经验”和“哲学”，甚至挟“科学”来扼杀“经验”和“哲学”，行吗？

在这个理念之下，我主张由中医自己来利用科学，不要由科学来左右中医。可是现实环境，却是背道而行，致使现代科学之下的中医，早已面目全非了——这就是我主张“纯中医”的理由之一。（摘录自拙著：《自然疗法与中国医学》）。

我维护传统医药文化暨创立“中华自然疗法”的心路历程和奋斗经过

（一）一九五二年，我为弘扬中国传统医药文化，开始在“台湾中国医药月刊”投稿。一九五三年，看到一篇攻击中医是属于“巫”的迷信医学，很不服气。乃于该刊第一卷第十一、十二期发表：《从中医方剂学看中国医药之进化》，举证“医食同源”，中医方剂学就是食的文化之发展，早已从𩇛而进化到𩇛（酉即酒）。中医将和中国烹调一样，风靡世界。

（二）一九五四年三月，德国许米特博士（Dr. Heuhent Schmidt）从日本学习中国医药返国时途经香港，向香港中医药界发表演讲，介绍西方的“同类疗法”。认为“同类疗法”类似“中医疗法”。是为我认识“同类疗法”之始。

按一九七九年，世界卫生组织呼吁，二十一世纪全球人类必将发展四个医学：1. 异类疗法（Attopathg）；2. 同类疗法（Home-

opathg); 3. 自然疗法 (Natunopathg); 4. 传统医学 (Tnaditionat Medicine)。按“异类疗法”即我们所说的西医,以反治反,例如“发烧退烧、发炎消炎”之类,一名“对抗疗法”。“同类疗法”以同治同,例如“用引起发烧的药治发烧、引起发炎的药治发炎”,一名“顺势疗法”。“同类疗法”有类于中医的“以毒攻毒”,引病外出。“对抗疗法”则是一种强压手段引病入裹。

(三)一九五五年二月,在香港中西医学张公让先生主编的《中国新医药》月刊上,拜读英国朋占明(harry Benjamin)著,迦勒译的《自然医学》。是为我认识“自然疗法”之始。

按“自然疗法”的大旨约如下述:1. 真正治病的是自然,不是医生;2. 重视疾病的统一性——万病一因;3. 疾病是朋友,不是敌人;4. 以食疗为第一,不吃药,一名不药疗法;5. 吃天然食品;6. 保护自然生态;7. 推行有机农业;8. 主张王道治法。

现代之“自然疗法”医学,是包括“同类疗法”在内。这二种医学,都反对“细菌致病说”,认为是先病而后菌。不是先菌而后病。即中国古语:“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不是先虫生之而后腐。

(四)一九五六年,立法院通过:“函请行政院筹设中医药研究机构”一案的时候,我假《自立晚报》为阵地(承该报让出社论专栏园地),与当时《自由中国》半月刊展开笔战,所写《中医的不科学和太科学》及《请政府制定一个符合于三民主义的中医政策》二文,为香港中国医药出版社收录在一九五七年《中医药年鉴》中。

(五)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四年,正值立法院讨论医师法草案之时,我主编由吴海峰医师主办的《革新中医》杂志,为维护中医权益而尽其棉力,并不断宣传自然疗法、同类疗法。

(六)一九五九~一九七一年,陆续在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医药》杂志发表维护中医药之论文。后来把它汇集成册,定名为:《陈妯艺医道革命言论集》,并查出国内最早介绍自然疗法者,当推国父孙中山先生。因国父之胃病,为日本自然